

中国共产党解放农民和赢得农民的统一

郑有贵^{1,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09)

摘要 解放农民、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战略支点。中国共产党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担当出发,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解放农民、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支点,使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赢得了农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解放农民和赢得农民的统一是中国革命成功走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至关重要的原因。农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演进中的选择,也是他们深切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获得解放和发展的选择。农民则以多种方式投身革命事业,在革命中锻炼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成人员而发挥更大作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力军,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工农联盟;农村革命根据地;解放农民;赢得农民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21)04-0015-09

中国共产党把解放农民和赢得农民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解放农民,一方面是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担当;另一方面是更好践行初心使命的战略选择,即中国共产党基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主体、农村广大、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领导农民革命,解放农民,赢得农民,进而扩大革命力量,农民也就日益成为革命的主力军。解放农民,赢得农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因素。

一、解放农民、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战略支点

为农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的要义之一。为了让农民过上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解放农民,让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农情出发,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解放农民、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为战略支点,在领导农民革命进程中成长壮大。

(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以工农联盟为

作者简介 郑有贵,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三农”问题。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百年道路、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021mgczd009)。

基础。马克思主义主张工农联盟。马克思是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工农联盟主张的。马克思指出,随着农民认识到自身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农民的支持,“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1]766,769,947}。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探索,经历了逐步深化和升华的过程。

第一,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民深受压迫和受剥削,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农民的革命性,缘于农民受压迫、受剥削。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革命性的认识,经历了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共二大认识到了农民参加民主革命的必然性,指出:“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2]131}中共三大进一步从外部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剥削造成农民的痛苦,分析了农民的革命性。大会指出:“自从各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强制输入外货以来,一般日用品的价格增高率远超过于农产品价格增高率,从前的农民副业(如手工纺织等)也全被摧毁。又自辛亥以后,军阀争地盘的战争连年不息,土匪遍于各地,再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如预征钱粮额外需索等),地痞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加困难。因此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各地农民之抗租抗捐的暴动,即其明证。”^{[2]263}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深入到阶层、阶级进行分析,中共二大使用“贫农”这一概念,中共三大把地主从农民中划分出来,也就更加深化了对贫困农民具有强烈革命性的认识。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办夜校补习班、讲演及之后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启发农民认识到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在于旧制度,唤起了农民参加革命的自觉。192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在“农民问题”部分指出,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2]198}。

第二,中国共产党基于农民数量众多的国情出发,认识到工人与农民联盟的重要性。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2]131}11月,《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指出,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2]198}。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强调:“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2]251}中共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更为明确地指出:“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2]349}

第三,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革命挫折和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于领导农民参与革命不充分,中共四大明确提出工农联盟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先是领导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遭受严重挫折。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于1923年2月7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史称“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继基于农民数量众多而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后,又从“二七”惨案中深切认识到仅仅领导工人阶级开展革命运动不够,还需要团结各革命力量,建立起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形成无产阶级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联盟。经过五卅运动后,1926年5月,张太雷在《五卅运动之分析及纪念之意义》中指出:“五卅运动没有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因中国的经济基础及人民的大多数——农民没有参加,中国国民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的参加,没有不失败的。所以五卅运动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怎样使全国农民来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农民所受的痛苦与压迫,使他们有彻底的革命性,能为工人阶级的永久同盟。只有大数量的农民参加,才能使国民革命运动成为一伟大的势力以抵抗强有力的敌人。”^{[3]296}中共三大起更多地关注和研究解决农民问题。这次大会形成关于农民问题的专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上,农民问题也被列为重要议题。中央局和湖南区委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会议报告中,都涉及农民运动情况。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提出工农联盟。

会议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在第一部分分析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议决案》指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重要地位。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是在农民中找到无产阶级的同盟，这是列宁主义与一切投机主义孟塞维克主义根本不同之要点，因为后者忽视那“睡觉”的农民阶级以为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的要素。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遭受严重的影响，然而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分。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4]239}。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议决案》，进一步阐释了工农联合的意义和提出了实现联合的具体办法。《议决案》指出，工人阶级推翻现存制度斗争中的“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中国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较工人尤甚。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大会提出从三个方面促进工农联合：工人回乡时，或在其工作的附近农村向农民作宣传，并帮助建立农民协会；工会与农会之间互派代表，工会设法帮助农会发展经济组织，如合作社等；农民如发生经济或政治上的斗争时，工会应领导工人加以援助^{[4]363-364}。9月至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制定通过的《中国现实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要和农民结成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所以在这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我们的根本责任，不但在于组织农民和给透明以思想上的指导，而且要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之中，巩固我们党的组织。”会议还提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巩固工农联盟的路径，即“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4]514}。这次会议提出实现工农联盟要满足农民有一份土地的要求和在农民中发展党的组织，

深化了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第四，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在中国革命中的战略地位。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制定的《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指出：“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足以引导国民革命到最后的胜利。”^{[5]106}9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中深刻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战略地位。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6]37,39}

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坚持工农联盟，将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①。

(二)解放农民、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成就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

基于大革命遭受到失败、敌我力量极其悬殊，基于当时国民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农村广大、农民数量庞大的国情，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中国的革命不可能走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先占领中心城市而来取得革命在全国胜利的道路，而是要在农村建立和发展根据地，积蓄革命的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这就突破了既有先在城市取得成功，进而向农村延伸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过程，也是解放农民、建立和发展根据地的过程，进而为全国革命胜利提供支撑的过程。

第一，创造性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在占领中心城市经受挫折后再探索中形成的。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先是照搬俄国先占领中心城市的道路，认为城市革命斗争高于农村革命斗争，把开展城市工人革命斗争、举行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作为工作重点。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发动南昌起义起的一段时间都是向城市进

攻,但由于国民党在城市的军事力量强大,有的攻打不下来,即便攻下城市也不能立足。毛泽东于1927年9月9日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攻打中心城市长沙也受挫。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果断作出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的决策。这成为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毛泽东带领起义军到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因为这个地区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各县建立过党的组织及农民协会;这里的部分旧式农民武装愿意与工农革命军联合;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便于部队筹款筹粮;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而湘赣两省军阀间又存在矛盾,控制这个地区的力量较弱。毛泽东抓住统治阶级内部破裂的有利时机,开展边界党、军队和政权建设。根据毛泽东指示,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于1927年11月成立。1928年2月中旬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地区的进攻,井冈山根据地也就初步建立起来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由此点燃。

第二,创造性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农情探索形成的。井冈山根据地面对外部四面白色恐怖和内部经济困难,党内有些人置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否存在和发展。毛泽东基于中国国情、农情对这一疑问作出坚定回答。1928年5月,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等进行了讨论,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10月和11月,毛泽东先后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撰写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和给中共中央撰写题为“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原理,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对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指出,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在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毛泽东还分析指出了发生这种奇事具有

的独特原因和发展条件:白色政权间长期分裂和战争,而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1926—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过反对地主豪绅阶级的农民运动;党组织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这又取决于农民的支持和对农民的政策;红色政权的存在、发展,需要有相当力量的红军,而农民是红军的主要来源;有便于红军作战的地势;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7]48-50,57。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基于对中国国情、农村经济性质、农村地理状况和农民革命及其对中国政治影响的科学把握而形成的。

第三,创造性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探索形成的。周恩来于1944年3月在中央党校所作的报告中,谈到毛泽东的思想转变时说:“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8]179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版时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对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中批评林彪轻视农村革命根据地而实行流动游击方式的主张,还批评了在全国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他指出,这些观点都不适合中国革命实情,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波浪式向前扩大政权发展等,无疑是正确的。还进一步指出,红色政权的存在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主要条件和最重要的因素。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

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分解;才能真正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之,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7]97-99}。这封信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与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在思想上实现了质的飞跃,是对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夺取政权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标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成。

第四,创造性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是与错误主张进行斗争后确立和坚持发展的。尽管攻打中心城市受挫,1927年11月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然强调,“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9]625-626}。1929年1月后,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推进了工农武装割据实践。4月,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虽然还没有突破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认识,但更加强调整应重视农村武装斗争。他在信中说:“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高潮的条件。”^{[6]55}尽管毛泽东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实践逐步推进,但还没有被中共中央明确为指导思想,相反有同志批评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于1930年6月致第四军前委的信中,还点名批评毛泽东“乡村包围城市”的所谓右倾思想,指责红四军“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是所谓的“农民意识”^{[10]276}。随着攻打中心城市受挫和农村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中共中央认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但只将其作为局部发展战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共中央开始重新认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遵义会议后,随着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领导地位的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才由局部战略上升为中国革命的整体战略。

1927年大革命失败起到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前的22年间,中国共产党把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军参战、土地改革、农村政权建设、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深受农民欢迎的方针政策,解放了农民,也促进了“三农”发展。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农民、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支点,为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进而为解放全中国、在全国建立人民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赢得农民

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解放农民,也就赢得了农民,农民则坚定地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农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

农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演进中的选择,也是他们深切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获得解放和发展的选择。

第一,农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最基本动力这一重大历史演进中,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选择。中国古代农民运动不断。进入近代,农民独立运动的开展难以取得胜利,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以失败告终即是如此。这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农民运动,没有先进理论指导,没有先进政党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并敢于付出巨大牺牲,也就难以获胜而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近代中国增添了资本主义和工业逐步发展的新因素,随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其中,新生的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中国工人阶级,具有坚决、彻底的革命性,又与最先进产业相联系,富有组织性、纪律性,成为革命的最基本动力。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勇于担当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正是历史演进到这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第二,农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在中国共产党唤醒农民并参加到农民运动过程中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找到农民问题的症结在于制度。中共一大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实行社会革命的根本政治目的,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中国

共产党领导建起的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衙前农民协会(一些时候、场合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其宣言明确指出,农民与地主的对抗不可调和,只有推翻不良的经济制度、封建政权,才能改变受剥削、压迫的命运^{[11][22]}。实际由中国共产党人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向农民讲授政治理论、农民运动理论及其实施方法,启发农民参加革命,是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摇篮。农民讲习所的课程有农民运动理论、世界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和自卫军组织方法、农民运动现状和趋势、中国农业情形及改良方法、农村教育、合作运动等。农民从讲习所和农民运动中深受启发,积极参加到革命洪流中。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沿途农民积极支持北伐战争,农民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迅猛开展起来。到1927年春,全国农民协会会员达900多万人。尤其在湖南,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清算罚款、取缔高利贷等斗争,建立农民武装,镇压恶霸地主和土豪劣绅。农民运动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变化,既显示出农民的革命精神、力量,也动摇了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

第三,农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定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过程中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民运动过程中,就针对地主阶级剥削,领导农民开展限田限租减息斗争,这就给了农民一定的生存条件。基于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并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基于“盖酿成经济之不平等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的认识,提出平均地权、扶助农工、改良农村组织。然而,由于国民党组成人员中不少有地主阶级背景,加之以核定地价的改良主义办法来实现“平均地权”的不彻底性,平均地权难以实现,地主只是缴纳一部分土地税给政府,劳苦农民分不到土地。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积极领导开展农民运动,致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仅如此,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右派仇视打击农民运动,捣毁农会,杀害农会干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也害怕农民运动,污蔑农民运动是“越轨”、“土匪”行动,以所谓破裂

统一战线为由,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进入土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汲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坚定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从此有了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地。中国共产党坚决满足农民拥有一份土地的愿望,与国民党难以实现平均地权,甚至后来镇压农民运动,形成鲜明反差,这使农民更加坚定地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12][47]}。

第四,农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在探索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进程中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农民运动,由于缺乏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民主政权的保障,很容易被反动势力破坏。中国共产党最早领导的、以衙前农民协会为起点的萧山农民运动,就很快被镇压下去。在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广东革命政府辖区内虽然合法化、公开化,但受到诸多限制,国共合作破裂后则惨遭失败。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起,中国共产党把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根据地政权建设结合起来,武装斗争保卫土地革命成果和巩固民主政权。经济和政治上翻身的农民积极支持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各项建设。这就成为根据地日益发展,并成功走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坚实基础。

第五,农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他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救世主凌驾于农民之上,而是与农民同甘共苦,主动与农民融到一起,以及找到了融入到农民群众中的方法。例如,《中国青年》第49期(1924年10月)发表文章,总结了开展农民运动的十条方法:到民间去工作,要穿民间衣服,说民间的话,吃民间的饭,每日作民间事一两个小时;清晨比农民起得更早,做事比农民还下劲;与他们谈话先问后答;要谦逊,并设法亲近他们;在他们面前可说笑话,但不可说骂玩笑话;想说帝国资本主义、军阀不好的,要从农民的痛苦说起;要有替农民解决问题的常识;在农民休息时,多对他们讲有趣故事和笑话;农民休息时,把自己会的玩意演给他们,演过后要告诉他们原因;对不同的人给不同的态度,令他

信服为止^{[11]35}。在创建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时,面对敌人封锁井冈山根据地而严重缺盐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与农民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深深感动农民群众,在农民群众中广为称颂。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军队在吃穿用等物质严重短缺的困难情况下,开展大生产运动,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军民生活实现共同改善。

第六,农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在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过程的选择。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榨下,近代中国农村生产动荡衰败。在传统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下,农民生活中本来就面临劳动力、耕畜、农具、资金等不足问题,遭受战争破坏和年轻人参军打仗后,这些困难更加明显。中国共产党不仅帮助农民获得土地,还根据可能,从实际出发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动互助、供销合作、信用合作、推广技术(1939年建立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开展农业科学研究;为集中技术力量开展咳血试验,1941年将边区农业学校的农业试验农场与光华农场合并为农业试验场)、兴修水利等,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进而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随之改善。

(二)农民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走向全国胜利,迎来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其中与农民对革命作出巨大贡献分不开。

第一,农民以多种方式投身革命事业。农民深切地感受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能得到解放和发展,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以历史上没有过的广度和深度参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在大革命时期,农民积极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增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期到大革命失败前的短短6年内,全国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的活动,由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近5.8万名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13]33}。在创建、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农民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参与根据地诸方面建设,与红军共同保卫根据地。例如,1928年8月,国民党军队乘红军主力在外之机,大举进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地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到红军统一部署的黄

洋界保卫战:参与修工事、背粮食、担任警戒;日夜赶削竹钉,并将竹钉插满黄洋界四周,筑起一条人民战争的“竹钉防线”,敌人因为山路狭窄陡峭和两侧有竹钉,前行困难;红军吹响冲锋号后,各山头的革命群众一边放起假机关枪——铁桶里放炮竹,一边用礮石滚木砸向敌群,这样的战势使敌指挥官误认为红军主力部队已经回至了井冈山,当夜仓皇遁逃。这次战争中军民的一致行动,筑起根据地的铜墙铁壁,创造了土地革命战争中以少胜多(3个营对敌人4个团)的经典战例,积累了宝贵的人民战争经验。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保卫了土地革命成果,进一步激发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热情。再如,在解放战争后期,仅淮海战役中,“支前”民工就达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0万人^{[14]801-802}。陈毅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农村妇女在中国革命中也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例如,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蒙阴县野店镇烟庄村男子参加到革命军队中,留下的妇女也以自己的方式投身革命事业。其中,6名妇女党员带领全村妇女为部队筹集草料、烙煎饼、做军鞋、送弹药、救伤员。1947年6月10日,《鲁中大众报》发表文章,称她们为“沂蒙六姐妹”,她们的故事传颂至今。农民以多种方式投身到革命中,扩大了革命力量,成功走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是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以及长征胜利、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刘少奇说,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要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人民头上屎撒尿。这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做到,做不到就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15]395}。

第二,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锻炼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成人员而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培养和发展农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农村党支部。1923年4月,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弓仲韬,受李大钊派遣,回到家乡河北安平县城村创办平民夜校,自己编了《平民千字文》教材,动员村里50多名青壮年农民到夜校学习。他在教农民

识字的同时,还向农民宣讲革命理论,以此为基础,及时建立台城村农民协会,并通过农民协会锻炼骨干、壮大力量、凝聚人心和维护农民权益。到8月,弓仲韬介绍思想进步又积极肯干的农民弓凤州、弓成山加入了党组织,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建立起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由此诞生。到1924年8月15日,由台城村、思敬村、北关高小3个党支部选派9名代表,参加在思敬村召集召开的安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建立起中共河北省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安平县委^[16]。农民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后,逐步形成坚定的革命意志,勇于为革命牺牲;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不仅严格遵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更是与农民群众鱼水相依。中国共产党通过政策制定和实施,引导农民树立大局意识,如针对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的问题,批判了狭隘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口号,强调要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区分新富农和旧富农。简言之,农民在革命进程中成长,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重大区别,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15]331}。中国共产党不仅引导农民参加革命,还将他们锻炼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就成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这对于农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是农民,为什么不能和农民混同呢?’我说你现在叫做共产党员,农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17]317-318}

第三,农民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力军。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把农民作为重要力量。农民参与革命,扩大了革命力量,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力军。1940年1月,毛泽东在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18]692}。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作出了与毛泽

东一致的论述:“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15]331}这些对农民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系的客观论述,清晰地呈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是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血肉相联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把握在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占绝对主体和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国情,深刻认识到中国农民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引导农民投身革命,并将农民培养锻炼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成部分,进而发挥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走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领导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重要原因所在。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3]张太雷.张太雷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七册[M].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1]武力,郑有贵,主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1921—2013)[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3.

[12]路易斯·惠勒·斯诺,编.王恩光,译.斯诺眼中的中国[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

[13]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

[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6]郑建生.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创建人[J].档案天地,2007(04).

[1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Unifying Liberating Peasants and Winning Peasants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eng Yougui^{1,2}

(1.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f CAS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2.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Liberating peasants, establishing and developing rural base areas is the strategic fulcrum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lead the people's revolution to victory. Starting from its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of seeking happ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rejuven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ased on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and took liberating peasants, establishing and developing rural base areas as the strategic fulcrum, enabled peasants to stand up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and won the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of peasants. Unifying the liberation of peasants and winning their support is the crucial reason why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ucceeded through the way of encircling the cities from the countryside. The peasants' choice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choice in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it is also a choice based on their deeply realization of that only by following the Communist Party can they achieve 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easants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cause of the revolution in many ways. During the revolution, peasants trained themselves and grew up as members of the proletarian vanguard, so that they became the main force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orker-Peasant Alliance; Rural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liberating peasants; winning peasants

(责任编辑 刘家俊)